

青绿山水铺展，琉璃幻彩流转，8位身着布衣的凡人各显神通——伴随中国动画电影《八仙!》陆续登陆北美、欧洲等市场，这样的画面在纽约、伦敦、悉尼、墨尔本等许多城市的户外广告牌上出现。

电影在过海，故事在出海。刚过去的这个夏天，《八仙!》成了不少海外留学生和当地朋友共同的话题。当从小听到的“八仙过海”传说真的漂洋过海，站在跨文化交流最前沿的留学生们，对“文化出海”四个字有了更真切的感觉。

在“功夫”与“熊猫”之外看见另一种中国

“在海外生活时间越长，我愈发感觉中华文化故事蕴含着巨大的传播价值。”正在香港大学攻读新闻传播硕士的宋益铭说，2020年到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分校读本科时，老师在课堂上讲到希腊神话、北欧史诗，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，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神话“八仙过海”是什么。那一刻的失落宋益铭至今记得。而《八仙!》的上映，让他觉得“小时候耳濡目染的故事，在异国他乡重逢时，才更清晰地认识到它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内容”。

对于在纽约大学斯坦哈特文化、教育与人类发展学院学传媒的黄诗笻来说，看《八仙!》的感受是“复杂”的，惊喜与距离感同时涌来。惊喜的是，能看到中国本土神话以成熟的动画形式走向海外；距离感则说的是，“诸如道家之类的概念，身边外国朋友理解起来会比较吃力”。

在香港城市大学读创意媒体文学硕士的耿嘉仪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《八仙!》在海外上映的消息，“看到那张充满水墨意境的蓬莱仙岛海报那一刻有一种奇特的感动。”她说，“就像小时候听长辈讲民间传说，那些模糊的记忆突然被高清修复了。”

耿嘉仪曾在伦敦留学三年，刚到香港不久。她给身边的外国同学看中国动画的片段，对方看到人物成仙前的身世磨难、因果轮回等相关设定时，常常一脸茫然。“很多刻在中国人认知里不用多说的故事底色，海外受众没有对应的知识积累，需要花时间去理解。”

这种复杂感受，或许正是当下中国文化出海的真实写照：一面是作品质量与国际影响力的稳步提升，另一面则是文化语境差异带来的传播鸿沟。

不少留学生都有这样的感受——外国同学聊起中国，第一反应往往是功夫、熊猫、龙、春节的红灯笼。

宋益铭认为，《八仙!》没有借用海外观众已经熟悉的中国符号，而是从中国传统神话IP“八仙”出发，再用现代动画、喜剧和冒险的方式重新讲述，这为外国观众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入口。

“All Wishes Come True”片名背后的传播智慧

令香港城市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席兰雅薇印象最深的是“众生皆可成圣”这个设定。她的一个外国朋友看完后，说第一次意识到“中国神话不只是关于天神下凡，更是关于普通人变



去里斯本前，我已很久没有真正“慢下来”。临近毕业，生活几乎被论文填满。我甚至忘了，生活不只是赶进度、改句子、等回复，也可以是走在陌生城市的石板路上，抬头看一树盛开的花。

从西班牙到葡萄牙，距离并不遥远，但抵达时，我仍感到一种微妙转换。里斯本不像某些城市用宏大和整齐迎接旅人，更像缓缓展开的一封旧信：起伏的坡道，碎石纹样的人行道，转角忽然出现的黄色电车，还有从高处望出去、被阳光照亮的红色屋顶。这里的一切都不急。风不急，云不急，街边的人也不急，连阳光落在建筑立面上的速度，似乎都比别处慢。

里斯本的路常上坡又下坡，走起来费力。你必须放慢脚步，常常要停下来。也正是在这样的停顿里，我忽然意识到，自己太久没有这样观察一座城市，也太久没有这样观察自己的生活。

抬头间，紫蓝色花朵一簇簇挂在校枝上，像把天空的一部分悄悄借给树。它们不喧闹，也不刻意争夺视线，却总在转角忽然出现，让人忍不住停下。我想到，人在忙碌时，很容易把生活压缩成一张任务清单，忘记那些看似“不重要”的部分：一场日落，一阵风，一条没有目的地的街，一棵只在某个季节盛放的花。可它们真的不重要吗？也许正是它们，在不知不觉中维持着人的柔软和清醒。

旅行还带给我另一个体验。刚学西班牙语时，启蒙老师曾说：“学会西语的人，也能听懂很大一部分葡语。”那时我半信半疑，只觉得西语和葡语同属罗曼语族，词汇和结构相似，大概在书本上可互相印证。可

在海外影院，我们为同一幕中国神话鼓掌

王 威

得更好”。对一个西方青年来说，这是全新的认知框架。“他之前以为中国神话的逻辑和西方一样是‘天选之人’，结果发现八仙里最动人的，反而是市井里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互相帮一把的瞬间。”

影片出海时，没有使用“八仙”的拼音，而是根据故事主题重新命名为《All Wishes Come True》（有求必应，愿望成真）。“它没有预设观众必须先了解八仙，而是先讲好一个关于普通人的故事。”宋益铭说。

在黄诗笻看来：“八仙是性格各异的普通人，有缺点、有烟火气，不是完美英雄。这种‘凡人修仙、渡人渡己’的内核，和好莱坞偏好的孤胆英雄、日式少年成长叙事都不一样。何仙姑一镜到底的打斗，杯子最后砸在自己斗笠上；铁拐李操着一口重庆话，三言两语勾勒出人物的市井底色。这些细节不需要任何文化注释，却能跨越国界，因为它们来自人物性格本身，强大却带着呆萌，热血又不失烟火气。”

在香港留学的唐莲对影片里的“烟火气”格外共鸣。她见过香港中环步履匆匆的上班族，也参与过学校里热热闹闹的节庆活动，看电影时一眼就认出，云雾缭绕的蓬莱，路口也立着“禁止逆行”的标识，神仙也要排队办业务，凡人们揣着“上岛发财”的期待蜂拥而至，活脱脱一个披着神话外壳的现代职场缩影。

“《八仙!》把神仙重新拉回了‘人’的位置。”唐莲说，片里的主角们有脾气、有执念、有短板，像极了身边每个为生活奔忙的普通人，而故事最动人的主线，从来不是“怎么拿到法力成为神仙”，而是“一群有弱点的人，怎么在选择里长出担当”。

怎样把中国传统神话讲给外国朋友听？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留学的方凯靓说：“如果本地朋友问我《八仙!》讲了什么，我会告诉他，这是8个普通人‘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’的故事。”在方凯靓看来，《八仙!》里环环相扣的剧情拉着人一路往下走，到最后“瞒天过海”的谜底一层层揭开，前面埋下的所有伏笔依次收束，不管来自什么文化背景的观众，看到这儿都会为精巧的构思叫一声好。

留学生是文化交流的“连接者”

《八仙!》登陆海外后，许多留学生自发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观影体验，“翻译”电影梗，解释八仙的来历。这种来自民间的、自发的传播，往往更能打动人。留学生知道如何用对方听得懂的方式讲述中国的故事，也知道如何在文化差异中找到共鸣的支点。

马来亚大学环境教育博士卢鸿雪说：“中国文化走出去不难，真正难的是走进来，走进不同国家年轻人的生活和内心。”在她看来，《八仙!》的意义不只是把“八仙”这个IP带到海外，更重要的是它用今天年轻人能够接受的方式，重新讲一个中国故事。“对很多海外年轻人来说，可能不知道吕洞宾是谁，也不了解八仙过海背后的文化典故，但是友情、成长、勇气，这些情感是不需要翻译的。”

“我给外国朋友推荐的时候，会告诉他们这是一个讲‘人怎么面对选择’的故事。”唐莲说，很多外国观众一开始会把《八仙!》当成一部东方奇幻“团队闯关片”看，但看到最后，真正留在心里的不是炫目的法术特效，而是最朴素的共鸣。

在卢鸿雪看来，留学生既是求学者，也可以成为文化交流的连接者——把真实、年轻、有温度的中国讲给世界，也把世界真实的声音带回中国。“如果一位马来西亚年轻人因为看了《八仙!》，开始主动去了解中国神话，甚至进一步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，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之后，又向前走了一步——从被看见，到被理解，再到被喜欢。”她说。

银幕上，8个没有通天法力的凡人凭着勇气和善意各显神通，跨过了翻涌的东海；银幕外，越来越多带着中国温度的故事，跨过语言和文化的海洋，走到世界观众的面前。文化出海或许就是留学生在异国他乡的影院，和身边不同肤色的朋友为同一个桥段鼓掌的瞬间；是散场的晚风里，你一句我一句聊人物、聊剧情、聊背后文化的时刻；是大家因为喜欢一个故事，愿意主动去了解一个国家、一种文化的过程。

左图：观众手持影片海报在美国洛杉矶一家影院参加中国动画电影《八仙!》北美首映礼。

曾 慧摄（新华社发）

他乡行思

再忙，也别忘了看花开

王 佳文/图

学了多年西语，直到这次来里斯本，我才第一次把这论断放到生活里验证。

走在里斯本街头，耳边不时传来葡语。最初听起来，它比西语更柔和，也更含混，音节像被风轻轻轻带过。有些词我明明在文字上认得，一旦被当地人自然说出，又变得陌生。餐馆菜单、地铁提示、街边招牌、朋友与当地人的对话，都成了临时的“语言课堂”。有时我能通过相似词根猜出大概意思，有时却完全跟不上语音变化；有时看到书面葡语，会忍不住与西语比较，发现二者既亲近又保持各自鲜明个性。

这让我想起，语言从不只存在于课本和文献中，而首先存在于生活里：人们点餐、问路、道谢、寒暄的声音，一座城市的街牌、菜单、广播和日常表情……书本知识固然重要，但只有当它进入真实环境，遇到具体的人、声音和场景，才会变得鲜活。老师当年那句话，不只是抽象的语言学判断，更是需要亲身经历才能真正理解的经验。这也让我再次意识到，跨文化不只是学术概念，也发生在每一次真实抵达中：听见葡语却下意识调动西语知识去理解，从书桌前走出来，重新把自己放回世界。

里斯本的美，是一种慢慢渗透的美。它不催促你立刻理解，只温和地邀请你停一停，看一看，坐一坐。也许正因如此，这座城市给我的最大礼物，是一种重新调整呼吸的能力。

旅行结束后，我知道自己仍要回到学术和毕业的节奏中。但这一次，心情不再只是紧绷。我带回来的不只是照片，还有一些更轻、更安静的东西：蓝花楹的颜色，里斯本午后的阳光，葡语掠过耳边的陌生感，朋友陪我走过坡道时的笑声，以及那个慢慢浮现的念头——努力很重要，生活也同样重要。

临近毕业，很容易把注意力放在终点。但这趟旅行提醒我，抵达终点之前，路边也有花开。支撑我们继续前行的，不只是对完成的执着，也包括那些短暂而明亮的停顿。它们让我们知道，自己不只是一个不断完成任务的人，也是一个可以感受风、语言、城市和人。

我希望自己能一直记得这趟里斯本之行，记得：再忙，也别忘了去看花开。

（作者系西班牙庞培法布拉大学翻译与语言学系博士研究生）

远航的书架

一天的忙碌结束，宿舍熄了灯，大家各自躺在床上，手机屏幕在黑暗中投下四块小小的光斑。有人刷短视频，偶尔发出一声轻笑；有人在群里聊天，指尖敲得飞快；有人打游戏，沉入虚拟世界。宿舍并不大，我们之间的距离不过两三米，却没有人开口说话。我盯着手机屏幕，忽然想到：我们明明是大学生活中距离最近的人，住在同一间宿舍，为什么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气泡里？

后来，当我翻开雪莉·特克尔的《群体性孤独》才渐渐明白其中的原因。

特克尔用十五年时间走进养老院和中学，访谈数百人，观察人们与电子设备相处的日常。她并没有控诉技术，而是描摹一种缓慢发生的变化：一部分是机器人时代人们对新型亲密关系的体验，另一部分则是网络化生存对亲密关系的影响。这种变化正是书中的核心概念“群体性孤独”——我们的身体在场，注意力却缺席；我们渴望亲密，却又害怕真正的亲密。

群体性孤独的概念可以用一句经典的网络语言来诠释：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在你身边，



你却低头玩手机。”在数字化的社会里，我们就像生活在同一片深海里，看似在一起，实际上却活在自己的气泡中。

书里举了一个相当古早的例子——拓麻歌子，日本万代公司于1996年11月推出的电子宠物机，人们在电子世界里饲养虚拟宠物；无独有偶，QQ宠物也曾在中国风靡一时。人们从虚拟中获得陪伴与慰藉。随着时代发展，社交机器人和老年人护理机器人也逐步参与这种新型亲密关系。书里写到养老院里的海豹机器人“帕罗”，它会眨眼，会对触摸做出回应，老人抱着它说：“它需要我。”它们的流行，来自人类难以割舍的孤独感，也来自寻求与他者联结的本能。

可电子宠物真的需要我们的饲养吗？机器人真的需要老人的互动吗？还是我们太累了，无力再承担另一条生命的需要，因此选择虚拟和机械？特克尔说，人们在机器人身上寻求的并非真正的陪伴，而是一种“孤独中的新型亲密感”——一种无需承担情感风险的联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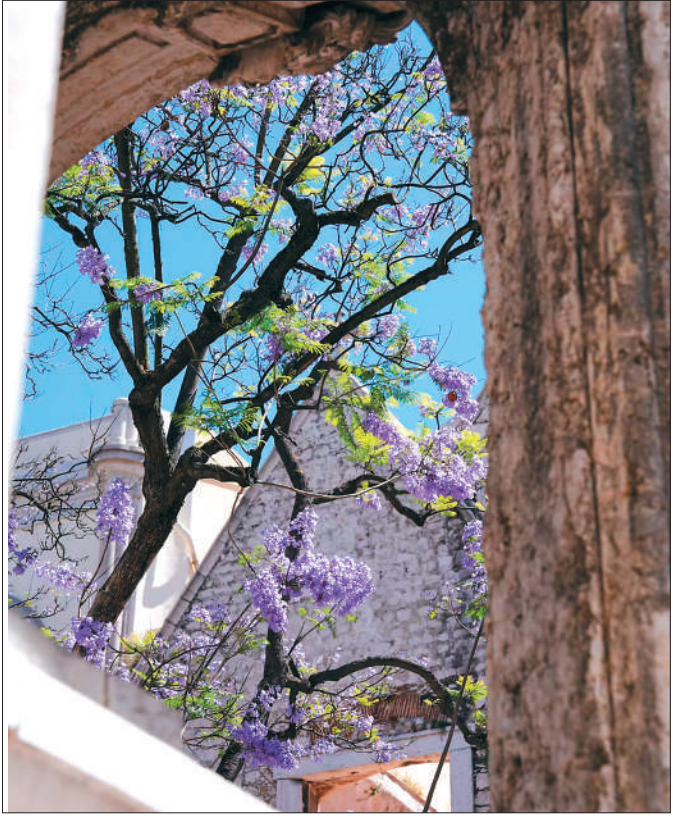
这种对低风险联结的偏好也影响了人与人之间 的亲密关系。书里一个女孩说，她宁愿发短信也不愿打电话，因为可以反复编辑，直到它完美。可对话从来就不是完美的。对话是磕绊的、停顿的、沉默的。我们正在用编辑短信的方式，练习一种没有瑕疵、却也没有温度的交流。特克尔认为，这种状态实际上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孤独感。

在社交环境里，我们身体在场，注意力却容易被网上的内容吸引；一开始我们有“控制技术”的幻想，但最终却“被技术控制”；在我们变得自由的同时，也受到束缚，成为特克尔所说的“半机器人”。

不过，从这本书中我也读到，特克尔并非要大家排斥技术。技术确实打开了另一种联结的可能：视频通话让身处异地的父母、恋人和朋友可以分享日常，网络社群可以让志趣相投的人走得更近……技术可以是“气泡”的制造者，也可以成为“桥”。

因此，关键不是把屏幕一关了之，而要学会有意识地连接：用消息维系远方的牵挂，也用面对面谈话承接身边的温度；让机器人辅助照护，而不让它们替代拥抱；让网络社群扩展连接，也不放弃真实世界的相遇。我们需要的不是拒绝技术，而是在技术越来越发达的生活里重新练习“在场”。

这本书出版已经十余年，但书中讨论的问题并没有过时。越来越发达的网络社会塑造出更寂寥的深海，也提供了更多连接的可能。我们仍生活在“身体在场，心却远离”的气泡里，人与人之间是变得更紧密，还是更孤独？读完《群体性孤独》后，我并没有从中得出确切的答案与解法，但我开始留意那些熄灭屏幕后的沉默，也珍惜屏幕亮起时那些真诚的问候，希望技术能成为通向彼此的一扇门。



里斯本一角。